

# 清代武官补子中的虎形纹饰演变与文化意蕴

魏欣, 薛菲莉

(武汉纺织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清代武官补子中虎形纹饰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与文化意蕴。基于图像研究和文献资料分析,溯源辨析虎纹补子的概念及应用范围,从虎纹造型表现、题材组合分析其纹饰特征,并结合清朝文化背景探究其文化意蕴。研究认为,随着清代历史脉络的演进,武官补子中的虎纹呈现出造型锐气渐消、题材形式固化的纹饰演变特征,表现出文化多元融合、审美传承发展的艺术特点,反映了皇帝对武官忠义勇猛的职责期盼,以及人们对国泰民安的祈愿。

**关键词:**清代;武官补子;虎纹补子;纹饰特征;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J 523.5;TS 9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6-0514-07

## Evolu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iger Pattern in the Patches of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WEI Xin, XUE Feili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tiger pattern on the military officials' badges in the Qing Dynasty exhibited different artistic form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image research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is study traces and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scope of tiger patter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corative features of these bad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ger pattern design and subject matter combination. It also explor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iger pattern bad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Qing Dynasty's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as the Qing Dynasty progressed, the tiger pattern on military officials' badges evolved into a form of diminishing sharpness in design, and a solidification of subject matter forms. This reflect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heritage, the emperor's expectations of loyalty, bravery, and courage from military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s spiritual pursuit for national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military official's patch, tiger pattern patch, decorative features, cultural implications

补子是明清时期缀于官服前胸后背处的图像标识,补子的使用和设计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象征意义。在武官补子中,虎形纹饰的形态和风格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它不仅代表着武官的勇猛和力量,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社会象征。目前,关于虎纹补子的研究散见于补服文化相关研究成果中,其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王渊<sup>[1]</sup>、HUGS B J A D等<sup>[2]</sup>、VALERY M等<sup>[3]</sup>、CAMMANN S<sup>[4]</sup>对

明清时期的补服制度、官补工艺进行研究。②大卫·哈古斯<sup>[5]</sup>、臧诺<sup>[6]</sup>、王宝林等<sup>[7]</sup>基于补子的纹样构成和特点对虎纹补子进行品级鉴别。③张蕾<sup>[8]</sup>、梁惠娥等<sup>[9]</sup>从虎纹补子的艺术特点和文化象征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解读。清代虎纹补子为四品武官所用,相较于品级较高的麒麟补子、狮补子,保留了较多的实物图,但目前学界对其纹饰特征和文化意蕴的研究尚不充分,特

收稿日期:2024-06-22; 修订日期:2024-09-19。

基金项目: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2D058)。

作者简介:魏欣(1968—),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Email:1850194651@qq.com

别是在探讨虎纹反映清代武官的社会地位、军事职能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分析。文中聚焦清代武官虎纹补子,通过梳理清朝顺治到宣统时期的武官虎纹补子实物,从历史的演进中分析其纹饰演变特点,进而探究其独特的文化意蕴。

# 1 虎纹补子的溯源与应用

虎在中国传统祥瑞动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驱邪避凶的象征<sup>[10]</sup>,虎纹也因此成为历代服饰中常用的装饰图纹。虎纹在不同时期服饰中的发展与应用见表1。

表 1 虎纹在不同时期服饰中的发展与应用  
Tab.1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iger patter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lothing

序号	年代	服饰名称	虎纹饰	参考图例	武官官职	品级	应用	图片来源
1 <sup>#</sup>	周朝(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	织绣冕服 <sup>[1]</sup>	宗彝(虎纹、猴纹)		无	无	身份标识	《三礼图》
2 <sup>#</sup>	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	龙凤虎纹		无	无	装饰效果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3 <sup>#</sup>	汉代(公元前206—220年)	“长乐明光”铭文锦	瑞兽纹(虎、豹、独角兽等)		无	无	装饰效果	楼兰孤台墓出土
4 <sup>#</sup>	唐代延载元年(694年)	对兽绣袍 <sup>[10]</sup> (联珠对虎锦)	虎纹		左右威武卫	正三品	身份标识	都兰吐蕃墓出土
5 <sup>#</sup>	宋代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	绣衣 <sup>[11]</sup> (浅褐色印双虎罗)	虎纹		兵部尚书	正三品	身份标识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
6 <sup>#</sup>	元代大德元年三月十一日(1297年)	胸背 <sup>[12]</sup>	虎纹	—	无	无	装饰效果	—
7 <sup>#</sup>	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胸背,花样 <sup>[13]</sup>	虎豹		县主仪宾,郡君仪宾	三品,四品(品官合补)	身份标识	《大明会典》
8 <sup>#</sup>	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	补子 <sup>[14]</sup>	虎纹		一等待卫,前锋参领,城守尉,包衣护军参领,王府一等护卫,宣慰使等	三品	身份标识	贺祈思收藏
9 <sup>#</sup>	清代康熙三年(1664年)	补子 <sup>[15]</sup>	虎纹		二等待卫,云麾使,防守尉,佐领,城门领,二等护卫,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等	四品	身份标识	北京保利拍卖行

注:“—”处,原文未注明,不详。

据《周礼》记载,虎纹最早在周朝被用作织绣纹样,即帝王冕服上所用十二章纹中的宗彝(见表1中1<sup>#</sup>)一章(南宋以前纹一虎一猴),可见虎纹饰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服饰等级标志,象征着帝王的勇猛

品德。战国时期的龙凤虎纹绣罗单衣中的虎纹象征中央政权(见表 1 中 2<sup>#</sup>)。汉代的“长乐明光”铭文锦(见表 1 中 3<sup>#</sup>)使用云气纹和瑞兽纹(虎、豹、独角兽等)描绘仙山仙境,结合纹样间隙的“长乐明光”铭文预示着天下太平,统治稳固。虎纹在朝代的更替中逐渐成为祥瑞与权威的象征,此后被历代沿用,尤其在武官服饰中更为常见。

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以虎纹代表官员职司起源于唐代,《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锦襍背衫,赐文武三品已上……左右卫武饰以对虎<sup>[16]</sup>。”这在都兰吐蕃墓出土的唐代联珠对虎锦(见表 1 中 4<sup>#</sup>)中有所印证。宋代亦有象征等级的虎纹官服,《宋史》记载:“其绣衣文:……兵部尚书以虎<sup>[17]</sup>。”南宋时期的一件浅褐色印双虎罗<sup>[10]</sup>(见表 1 中 5<sup>#</sup>),亦能窥测宋代的虎纹形象。元代流行“胸背”,指在前胸后背处织的一块方形图案,该词最早出现在蒙元文献《通制条格·服色》中,此时的虎纹胸背并无等级之别<sup>[15]</sup>。

唐宋以动物区分官员等级的方式和蒙元胸背装饰的形式延续到了明清,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官补服饰制度。明清时期武官虎纹补子的官品花样经历了几次修正: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大明会典》规定“武官三品四品,虎豹<sup>[13]</sup>”(见表 1 中 7<sup>#</sup>);清初顺治九年(1652 年),《清实录》更改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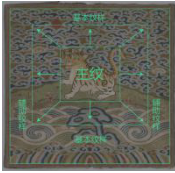



品官用虎补<sup>[18]</sup>”(见表 1 中 8<sup>#</sup>);清代康熙三年(1664 年),《清实录》复定“四品官用虎补<sup>[18]</sup>”(见表 1 中 9<sup>#</sup>),自此确定武官虎纹补子为四品。综上,虎纹官补起源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先后成为武官三品、四品的象征,是中国传统官服中独特的物象符号,在洞悉清代历史和武官补子的发展上具有重要价值。

## 2 清代武官虎纹补子的纹饰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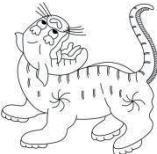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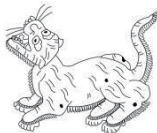
清代补服在服饰方面既保留了游牧民族传统特色,又借鉴了明代以禽兽补子区分文武官的官服制度,在明代补服制度的基础上经历了不断吸收与修正的过程。清代武官虎纹补子的表现形式见表 2。笔者对清代武官虎纹补子进行整理,发现虎纹补子由主纹、基本纹样和辅助纹样构成:主纹为官补中心的虎纹,基本纹样包括太阳纹、云纹和海水江崖纹,辅助纹样则包括杂八宝(也称儒教八宝)、佛八宝、道八宝和各种福寿寓意纹等。为更好地梳理清代武官虎纹补子的纹饰演变过程,文中以清代发展的 3 个阶段为主线,即顺治、康熙(1644—1722 年)为清早期,雍正、乾隆(1723—1795 年)为清中期,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1796—1912 年)为清晚期,选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武官虎纹补子,分别从造型表现、题材组合对虎纹补子进行探讨。

表 2 清代武官虎纹补子的表现形式

Tab.2 Representation of a tiger pattern patch for a military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编号	时期	名称	图示	造型表现			题材组合		图片来源
				构图	主纹样	特征	搭配纹样	特征	
1 <sup>#</sup>	清早期	三品武官虎纹补子(缙丝)		中心主体式构图		威武勇猛	云纹, 海水江崖纹, 杂八宝,	简明朴素	贺祈思收藏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平金地彩绣)							
3 <sup>#</sup>	清中期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缙丝)		藻井骨架式构图		灵动祥瑞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灵芝, 蝙蝠纹, 杂八宝	繁华多样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4 <sup>#</sup>		四品武官命妇虎纹补子(缙丝)							

《中国文武官补》

续表									
编号	时期	名称	图示	造型表现			题材组合		图片来源
				构图	主纹样	特征	搭配纹样	特征	
5 <sup>#</sup>	清朝嘉庆 (1796—1820年)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打籽绣)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蝙蝠纹, 水仙, 卷草纹, 桃纹, 道八宝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6 <sup>#</sup>	清朝道光 (1821—1850年)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丝绣)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蝙蝠纹, 水仙, 桃纹, 牡丹, 灵芝, 回纹, 佛八宝, 杂八宝		《补子》
7 <sup>#</sup>	清晚期	清朝咸丰 (1851—1861年)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丝绣)	自由式构图		稚拙疲软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蝙蝠纹, 水仙, 回纹, 佛八宝	繁琐堆饰	迈克尔·史密斯收藏
8 <sup>#</sup>	清朝同治 (1862—1874年)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丝绣)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蝙蝠纹, 水仙, 灵芝, 卷草纹, 万字纹, 回纹, 佛八宝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9 <sup>#</sup>	清朝光绪 (1875—1908年)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盘金银绣、丝绣)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佛八宝		《清代官补》
10 <sup>#</sup>	清朝宣统 (1909—1912年)	四品武官虎纹补子(缎绣)					太阳纹, 云纹, 海水江崖纹, 蝙蝠纹, 折枝花纹, 水仙, 灵芝, 杂八宝		故宫博物院

2.1 应时赋形的造型

虎为百兽之长,能执搏挫锐,清代武官虎纹补子以虎为主纹标识来宣扬雄威。清康熙后,虎纹被用于四品武官补子中,处于九品武官体系的中间阶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枢纽作用,其造型表现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与军队实力的体现,见证着王朝的更替与历史的兴衰。

清朝初年正待开基立业,顺治、康熙时期的虎纹(见表2中1<sup>#</sup>,2<sup>#</sup>)目光如炬、四肢健壮、爪牙锋利,虎身点缀着规律的弯曲条状斑纹,以坐拥山河、睥睨天下之势体现出统治者称王天下的野心。可见清早期的虎纹造型饱满坚毅、生机勃勃,呈现出“威武勇猛”之势。

雍正、乾隆时期物质相对富裕,此时的虎爪(见表2中3<sup>#</sup>,4<sup>#</sup>)有所收敛,消减了凶猛锐气;斑纹在臀

部两侧形成特殊的旋状长势,呈现一对顺时针或是逆时针的漩涡状纹样,这种抽象符号纹样具有“循环往复”“绵绵不绝”“一帆风顺”的吉祥寓意。可见清中期虎纹形象的精致华美、虎神飞扬,与清早期威严可畏的虎相比更具“灵动祥瑞”之势,是国力强盛的映射。

嘉庆时期朝廷实力衰退,虎纹形态变得简朴幼态,如形体结构用光滑的长曲线概括,斑纹短小且分布随意,足部变为爪状;老虎年龄处于幼崽阶段,牙齿还未长齐,与清早期威风凛凛的虎将气度大相径庭(见表2中5<sup>#</sup>)。道光时期的虎纹,斑纹变成了规律的月牙状,造型更显憨萌温顺(见表2中6<sup>#</sup>)。清咸丰时期国家没落,虎的形态已然模糊难辨,虎身上独特的斑纹变成了逗号形状的线条,虎纹形象粗犷随意,虎气稚弱(见表2中7<sup>#</sup>,8<sup>#</sup>,9<sup>#</sup>,10<sup>#</sup>)。总

体而言,清晚期武官补子上的虎纹呈柔弱萎靡的“稚拙疲软”之势,反映出国家内忧外患的动乱状况。

## 2.2 礼制规定下的题材

虎纹补子作为武官补子中的中高等品级代表,其题材组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皇权思想和官员的祈愿心理。

顺治初期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清统治者没有建立新的服饰制度,顺治初年的武官虎纹补子还基本遵循明朝旧制。如武官虎纹补子中没有出现太阳纹,云纹以“L”形相互连接、环绕,寓意绵延不断(见表2中1<sup>#</sup>)。康熙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清统治者对服饰制度进行了重新制定和规划,武官虎纹补子的题材组合也得到了优化(见表2中2<sup>#</sup>)。如出现太阳纹,云纹以“Z”形、“L”形相互连接、交叉,以灵芝形状寓意长寿,杂八宝以成对形式分布在海水中,但补服整体仍延续明朝旧制,呈现出“简明朴素”的特点。可见,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通过因循明朝旧制的方式,来融合汉民族文化思想、稳固政权。政局稳定后虽对补服制度进行了更改,但题材样式没有根本变化,补子的题材组合仍呈现缓慢而稳定的发展状态,体现了清统治者对社会稳定发展与巩固统治思想的重视。清代武四品官补子如图1所示。

乾隆时期,《皇朝礼器图式》规定了武四品官补子的样式,补子纹样搭配齐全,绘制有虎纹、基本纹样和辅助纹样[见图1(a)<sup>[14]</sup>]。正如雍正、乾隆时期的武官虎纹补子(见表2中3<sup>#</sup>,4<sup>#</sup>),云纹扩散开来,均匀覆盖了整个背景;海水纹整体外观连贯流畅,与太湖石造型的江崖纹组合象征着“万世升平、江山永固”;杂八宝均匀分布在空中和水中,整体搭配自然和谐、繁荣有序。可见清中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后,武官虎纹补子开始大量组合应用杂八宝与福寿寓意纹,纹样组合形式丰富多彩。

嘉庆时期,《钦定大清会典图》(嘉庆朝)制定了武四品官补子的基本样式,以虎纹和基本纹样为题材组合,大部分补子实物中的辅助纹样根据皇帝、官员的喜好进行增减[见图1(b)<sup>[19]</sup>]。嘉庆朝的武官虎纹补子根据皇帝的道教信仰添加了道八宝(见表2中5<sup>#</sup>)。道光时期,边框、祥云、五蝠、杂八宝<sup>[20]</sup>等都布置在预定好的位置,海水中还出现了部分佛八宝,宝物数量达到了巅峰(见表2中6<sup>#</sup>)。咸丰时期励精图治、力求节俭,象征财富、升官、享福之类的辅助纹样几乎全被去掉,佛八宝占比加大(见表2中7<sup>#</sup>)。同治时期云纹地子上加入了蝙蝠纹与万字

纹等,表达了对万福的祈愿(见表2中8<sup>#</sup>)。光绪时期禁止奢华,补子式样宣扬节俭,《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朝)规定了武四品官补子样式以虎纹与基本纹样组合[见图1(c)<sup>[21]</sup>],但此时期武官虎纹补子中加入了佛八宝,并采用颇为奢靡的盘金、盘银线制作(见表2中9<sup>#</sup>),反映了此时期皇权衰落、官员腐化的现象。宣统时期武官虎纹补子(见表2中10<sup>#</sup>)上的水纹变为早期的平水样式,反映了对过往盛世的怀念<sup>[4]</sup>,但纹样简单堆砌,毫无艺术性可言。



(a) 乾隆武四品官补子



(b) 嘉庆武四品官补子



(c) 光绪武四品官补子

图1 清代武四品官补子图例

Fig.1 Illustrations of the rank badge for fourth-rank military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武官虎纹补子的题材组合,由清早期延续明朝旧制的“简明朴素”,表现出维护社会稳定下艺术与形式的稳定发展;到清中期遵循礼制的“繁华多样”,展露出四海升平景象下艺术交融的鲜活气象;再到清晚期虽有制式规定,但纹饰简单堆砌,表明了皇权没落下艺术创造的式微。武官虎纹补子纹饰的变化体现了礼制影响下历代帝王、官员的审美意趣与价值取向,呈现了时代发展下形式多变的艺术特征。

### 3 清代武官虎纹补子的文化意蕴

#### 3.1 文化交融、审美多元的艺术表现

清代武官虎纹补子作为封建礼制的服饰载体与文化符号,其艺术表现形式是满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呈现,也是皇帝审美与官员审美相辅相成的生动体现<sup>[22]</sup>。从礼制文化的角度看,清朝的民族文化多元共生,武官虎纹补子的艺术表现在多种思想文化影响下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政策与祈愿心理。清早期、清中期儒家文化备受推崇<sup>[23-24]</sup>,虎纹补子多采用象征儒家传统文化的吉祥纹样杂八宝(见表2中1<sup>#</sup>,2<sup>#</sup>,3<sup>#</sup>,4<sup>#</sup>)。嘉庆时期,由于皇帝信仰道教,开始提倡采用道八宝(表2中5<sup>#</sup>),蕴含着保佑社稷平安之意。道光时期,随着社会动荡加剧、战乱不断,人们转向佛教寻求心灵抚慰,佛八宝便出现在武官虎纹补子中(表2中6<sup>#</sup>,7<sup>#</sup>,8<sup>#</sup>,9<sup>#</sup>),表达着祈求佛祖祝佑、为众生造福之意。清代武官虎纹补子的纹饰演变体现了历代皇帝宗教信仰的变化。

#### 3.2 忠义勇猛、比德于虎的情感寄托

《风俗通义》记载,“山有猛虎,草木茂长。故天之所生,备物致用,非以伤人也。然时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sup>[25]</sup>。”虎虽凶猛而含仁怀义,表明虎在古人心中是有灵性的神物,忠义威猛而无敌,武官虎纹补子可以让人们望图而识其职守。《清史稿·职官》对其职责有着明确的说明:“侍卫掌营卫周庐,更番侍直……前锋参领、侍卫掌督率前锋,警蹕宿卫<sup>[26]</sup>。”可见服虎纹补子的武官,主要职责有皇宫警卫工作、看守重镇之地、督视军旅之事等,担负着重要的军事指挥和管理职责。“比德于虎”的审美思想寄托了皇帝的治理思想,皇帝借虎的健硕体态和仁义脾性比喻武官的忠义勇猛,并明确了服虎纹补子的武官需要有忠诚正义的品格和维护治安的负责情怀。

#### 3.3 驱邪纳祥、护国佑民的健康愿望

虎是猛兽的代表,虎纹有着驱邪纳祥的吉祥文化内涵,为了增强虎纹辟邪驱魔的作用,部分武官虎纹补子会在虎纹周围搭配火焰纹。纵观清代武官虎纹补子可以发现:当国家统治不稳定,处于开拓发展状态时,虎纹的形象威严雄壮,在画面中占据大部分空间,以强调虎纹气势。当国力强盛,社会经济繁荣时,通过虎纹与各类植物、吉祥纹协调搭配,反映出文化的自信。而当国家发生动荡、战乱时,民众期盼借助虎的神力来抚慰心灵、保佑生

命,故补子上布满了各种吉祥纹饰,使得武官虎纹补子画面充盈、祥瑞辐辏,寄托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清代武官虎纹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代表着人们对国泰民安、社会安宁的期望和愿景。

### 4 结 语

清代武官虎纹补子是社会思想的体现和文化精神的沉淀,通过梳理文献与搜集清代武官虎纹补子实物图,分析虎纹补子在造型表现、题材组合上的纹饰演变,并结合社会背景探究其文化意蕴。在清朝历史发展中,虎纹造型气势伴随着国运兴衰而变化,纹饰搭配呈现了文化兼容并包下审美多变的时代特征;虎纹人格化的审美思想,蕴藏了统治者对武官勇猛精进的职责期盼和忠诚仁义的品格寄托;祥瑞纹饰的选用和布局形式,体现了人们祈愿长治久安、吉象呈瑞的精神追求。

#### 参考文献:

[1] 王渊. 服装纹样中的等级制度:中国明清补服的形与制[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6: 46-60.

[2] HUGUS B J A D. Ladder to the clouds: intrigue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rank [M]. Berkeley: Ten Speed Press, 1999: 193-250.

[3] VALERY M, GARRET T. Mandarin squar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3-45.

[4] CAMMANN 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darin square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4, 8 (2): 71.

[5] 大卫·哈古斯. 补子:明清时期的品级标识[M]. 王敬雅, 仇泰格,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37-95.

[6] 臧诺. 清代官补[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 252-269.

[7] 王宝林, 宗凤英. 中国文武官补[M].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7: 10.

[8] 张蕾. 明代虎镇五毒方补的艺术表达与造物理念[J]. 丝绸, 2023, 60(2): 156-162.

ZHANG Lei.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cre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quare buzi entitled "the tiger suppressing five poisonous animals" in the M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Silk, 2023, 60 (2): 156-162. (in Chinese)

[9] 梁惠娥, 张书华. 明代岁时节日服饰应景纹样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J]. 丝绸, 2017, 54(4): 79-86.

LIANG Huie, ZHANG Shuhua. Art features and influen-

tial factors of specific dermatoglyphic pattern on traditional festival costume in M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Silk, 2017, 54(4): 79-86. (in Chinese)

[10] 刘天尧, 龚彧龔, 赵珂然, 等. 汉代画像石纹样在男靴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4, 34(4): 81-87, 93.

LIU Tianyao, GONG Yuyan, ZHAO Keran, et al.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Han Dynasty portrait stone patterns in the design of men's boots[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4, 34(4): 81-87, 93. (in Chinese)

[11] 福建省博物馆. 福州南宋黄升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170.

[12] 黄时鉴. 通制条格[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134.

[13] 申时行, 赵用贤. 大明会典[M]. 内府, 明万历 15: 555.

[14] 允禄. 皇朝礼器图式——冠服: 卷 5[M]. 牧东, 点校. 扬州: 广陵书社, 1761.

[15] 赵丰. 中国丝绸艺术史[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212.

[16] 刘煦.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530.

[17] 脱脱. 宋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2856.

[18] 中华书局影印. 清实录: 世祖章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01-503.

[19] 中华书局影印. 清实录: 圣祖仁皇帝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98.

[20] 李珍. 基于实物样本的晚清汉族女装二十四孝纹样解析[J]. 服装学报, 2023, 8(1): 50-58.

LI Zhen. Analysis of twenty-four filial piety patterns on Han women's costumes in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physical samples [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3, 8(1): 50-58. (in Chinese)

[21] 庆桂. 钦定大清会典图: 卷 47[M]. 内府, 清嘉庆 16.

[22] 马逸初, 郭奕宏. 传统纹样内涵的三个层次及其现代设计价值[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2, 29(4): 64-67.

MA Yichu, GUO Yihong. Three layers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modern design[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2, 29(4): 64-67. (in Chinese)

[23] 李世荣. 满与汉: 清代民族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考察[M].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5: 178-179.

[24] 李俞霏, 范卓雅, 王云飞. 清代服饰中三多纹艺术特征分析[J]. 服装学报, 2024, 9(3): 243-249.

LI Yufei, FAN Zhuoya, WANG Yunfei. Study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sanduo patterns in Qing Dynasty costumes[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4, 9(3): 243-249. (in Chinese)

[25] 崔豹. 风俗通义[M]. 新 1 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63.

[26] 赵尔巽. 清史稿[M]. 清史馆, 1928: 427-491.

(责任编辑: 卢 杰)